

社会建设

社会信任视角下的农民工城市融合

——基于上海的实证分析

郭庆¹, 高平安², 余运江³

(1.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12;

2. 湖南农业大学 东方科技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28; 3. 华东师范大学 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 上海 200241)

[摘要] 社会信任对于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为理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基于对上海的抽样调查资料, 通过 OLS 回归模型发现, 特殊信任、一般普遍信任和典型普遍信任更多地对农民工社会心理文化层面的城市融合有影响, 对经济层面的城市融合影响有限, 仅有一般普遍信任对经济融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此应积极引导农民工树立自信, 减少本地居民与农民工之间的不信任因素, 加快相关制度改革, 拓展对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

[关键词] 农民工; 社会网络; 社会信任; 城市融合

[中图分类号] C91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963(2014)04-0055-06

Abstract: Social trust, having played an important effect on migrant workers' blending in urban life, provides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analytical tools for understanding the people's city integration. Based on a sample survey in Shanghai and by using OLS regression model the paper found that special trust, common and general trust, and typical trust had more impact on the people'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with limited influence on their economic adaptations, which is whereas positively impacted only by the common and general trust. It is hence to guide actively the migrant workers to set up self-confidence, to reduce the distrust between them and the local urban residents, to accelerate the reform of related systems, and to expand the social support network for the migrants.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social network; social trust; city blending

农民工城市融合领域主要存在三种研究范式: 地位结构观范式、网络结构观范式、制度结构观范式。其中, 从网络结构观的视角看, 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具有社会嵌入的特征, 即“嵌入”于当下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之中。本文亦引入社会结构变量, 但并非仅仅套用社会网络结构的分析框架, 而是着力于探讨与社会网络资本相关的研究中不常见的社会信任的影响和作用。社会信任对于关系的建立和维持非常重要, “离开了人们之间的一般性信任, 社会自身将变成一盘散沙”^[1]。

对于农民工这一群体而言, 受户籍制度阻隔、自身流动性增加以及底层认同、弱势群体认同情绪等因素的影响, 其社会信任状况值得重点关注。但是, 农民工社会信任问题的相关研究仍旧显得非常薄弱, 而社会信任视角下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的研究就更加少见。有鉴于此, 本研究从社会信任的视角介入, 通过对社会学和人口学领域内的信任问题和城市融合问题进行分析, 进一步提升城市适应与融合研究的理论层次。

[收稿日期] 2014-03-09; **[修订日期]** 2014-09-09

[基金项目]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青年教师科研基金项目(2014GGY03); 湖南师范大学校青年科研基金项目(14XQN07)

[作者简介] 郭庆(1985-), 男, 江西新余人,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 社会保障、人口社会学。高平安(1985-), 男, 湖南益阳人, 湖南农业大学讲师, 研究方向: 教育社会学。余运江(1988-), 男, 江西宜春人,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区域经济政策。

一、相关理论回顾

(一) 社会信任的概念

在国内的研究中,社会信任通常是指一种对交往对象的“保障感”^[2]和“可靠性预期”^[3]。实际上,国外哈丁等学者也从预期的观点出发,认为社会信任代表着信任者对被信任对象可能行为的一种积极性的预期^[4]。因此,社会信任通常包括两方面的内涵^[5]:第一,信任发生在个体的人际关系之中,是人际交往的产物。第二,信任代表了一种“放心”或“认同”的心理状态。

(二) 社会信任与城市社会融合

1. 作为社会习俗的社会信任与城市融合

前期研究认为,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过程是农民工学习掌握城市的习俗、规范、观念的过程。而社会信任也是一种价值观念或者说是一种社会习俗,具有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差异。城市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性、高流动性等特征导致了与农村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信任环境。在现代城市社会中,社会信任关系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后天建构起来的,与乡土社会天然的熟悉关系具有明显不同^[6]。因此,农民工需学会如何与城市里的各色人等打交道,努力建构自身的社会信任模式以便融入城市生活。

2. 作为社会资本的社会信任与城市融合

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社会信任,对于农民工在城市的和社会融合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一,信任与社会关系网络相互加强,有利于扩大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积累。信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7]。更进一步说,信任和关系是相互嵌入的,人们之间的社会信任既来源于他们的社会关系网,同时又能进一步促进人际之间的交往与互动,从而扩大个人的社会关系网。因此,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反映了社会资本状况越好,而社会资本状况越好,就越有利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

第二,信任能减少生存环境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带来较高的本体安全感。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充满不确定性。面对如此环境带来的挑战,信任机制能够担负起责任。信任是一个简化机制,具有“简化复杂功能”^[8],通过在场互动所创造的确定性来对抗行动后果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达到吉登斯所谈论的个体在现代社会中的本体性安全感。

已有学者证实社会信任降低了农村劳动力在社区内部生活所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9]。透过与另一方交换彼此的信任,能够为个体的社会交往提供一种较为稳定的心理保障,尤其在熟人之间,信任可以降低交往的风险和心理成本。如此一来,农民工在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中也就多了几分安全感和信任感。

3. 作为社会心态的社会信任与城市融合

已有研究认为,农民工只有在心理层面对城市产生认同感才算真正实现了城市融合,而社会信任作为一种社会心态,代表着一种积极正向或消极负向的情绪。因此,社会信任与农民工对城市的心理认同和归属感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也就是说,认同或疏离与社会信任或不信任的一般态度相关联^[10],信任有助于培育认同感并激发参与热情。相反,就很可能引发一些不信任的行为,如不愿意交往、不愿参与等。因此,在农民工城市融合的语境下,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意味着一种积极正向的情绪和心态。它不仅提供了情感交流的意愿,也有助于提高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度和归属感。而农民工在城市一旦遭遇本地居民歧视,便容易滋生仇恨、愤怒、怨恨、敌意等负向情绪,降低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信任程度,使他们与城市中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实际交往与合作更加难以维系,从而影响了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甚至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用卡斯特的话来说,如果人们缺乏互信,觉得对方不值得信任,人们就容易陷入失去依靠的“社会孤立”状态^[11],猜忌、偏见、孤独和冲突便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关注农民工的社会情绪,特别是关注农民工的社会负向情绪,努力减少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不信任,有助于缩短农民工与城市的心理距离,促进农民工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城市融合。

以上研究成果表明,无论是作为一种社会习俗的信任,还是作为一种资本的信任,抑或作为一种社会心态的信任,社会信任都将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过程产生重要影响,从而为我们理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提供很好的视角。

二、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主要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在上海市进行的“农民工社会信任与城市融合”抽

样调查。本调查共分为 2 个时期,分别在 2012 年 7 月和 2013 年 5 月进行,采用多阶段抽样和简单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依次抽取区(县)、街道(镇)、居(村)委会、门牌号、被访者,保证每一个样本被抽取的概率都是均等的。剔除无效问卷后,最终纳入分析的有效样本量为 930 份,有效回收率达 88.3%。

从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分析可以看出(见表 1),男性农民工占 54.9%,女性农民工占 45.1%,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 34 岁,平均居留时间为 7 年。农民工已婚者的比例最高,为 62.8%,其余约 30%为未婚、离婚和丧偶人士。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占 57.2%,其次为小学及以下,占 22.9%,高中/中专、大专所占比重分别为 15.5%、4.4%。月均收入为 1 501~3 000 元人群最多,为 52.6%,3 001~5 000 元的人群次之,为 31.4%,1 500 元及以下的人群为 10.2%,5 000 元以上的人群最少,仅为 5.8%。

表 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基本特征		频数	百分比	基本特征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511	54.9%	迁移方式	一个人	278	29.9%
	女	419	45.1%		部分家人在一起	487	52.4%
					全家都在上海	165	17.7%
年龄	≤20 岁	59	6.3%	月均收入	1 500 元以下	95	10.2%
	21~30 岁	229	24.6%		1 501~3 000 元	489	52.6%
	31~40 岁	471	50.6%		3 001~5 000 元	292	31.4%
	≥41 岁	171	18.4%		5 000 元以上	54	5.8%
	Mean	34 岁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213	22.9%	婚姻状况	未婚	255	27.4%
	初中	532	57.2%		已婚	584	62.8%
	高中、中专	144	15.5%		离婚	53	5.7%
	大专及以上	41	4.4%		丧偶	38	4.1%
	Mean	7 年					
居留时间	一年以内	42	4.5%				
	1 年到 5 年	236	25.4%				
	5 年到 10 年	509	54.7%				
	10 年以上	143	15.4%				
	Mean	7 年					

农民工个人迁移的比重比较小,为 29.9%,超过七成的人都是家庭化迁移(包括部分家庭成员同住和举家迁移)。

三、变量测量

(一)社会信任的测量

在分析社会信任概念表征及内涵的基础上,本文将社会信任置于一定的社会交往情境中进行测量。根据韦伯对信任类型的二建构法和相关文献^[12],将农民工的社会信任划分为特殊信任、一般普遍信任和典型普遍信任 3 个方面。

首先,特殊信任反映了农民工对传统熟人圈内关系的信任。文中通过 3 个指标来测量:“如果我生活中遇到了什么困难,我相信我的亲戚或同乡们会尽量帮助我”、“如果有亲戚或同乡向我借钱急用,我会借给他”和“当我遇到重要问题要做决定时,我会找我的亲戚或同乡商量解决”。每个指标的答案分为“非常同意、比较同意、不太同意、很不同意”,分别赋值 4 到 1 分(以下信任指标也采用类似的方法赋值)。将上述 3 个单项指标取值加总后取均值,范围在 1~4 分之间,得分越高,说明信任水平越高。

其次,普遍信任反映了农民工对传统熟人关系圈外的信任。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一般的普遍信任,即对本地居民、老板或单位领导、一般朋友的信任,通过 3 个问题来测量,“我相信与本地居民交朋友是有可能的”、“我相信本地居民愿意与我们打工者相处”和“大多数老板(或单位领导)会尽力去帮助我们打工者”。将 3 个单项指标取值加总后取均值即为一般的普遍信任水平;二是典型的普遍信任,即对陌生人、社会大多数人的信任,通过“我相信社会大多数人都是好的和善良的”和“不管认识不认识,老人摔倒了都会有人把他扶起来”2 个指标来测量,将 2 项指标取值加总后取均值,得到农民工典型的普遍信任水平。

(二)城市融合的测量

城市社会融合是一个多维度概念,指农民工与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界限不断模糊和消解的过程。本文在借鉴国外社会融合理论的同时更加注重进行本土化测量,从以下 8 个指标衡量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状况,并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探索其结构维度。具体指标为工作满意度、办理本地社会保险、本地语言掌握程度、本地文化认同程度、城市价值观认同、收入满意度、未来居留意愿、社会交往范围。指标具体操作化测量如下:工作满意度,指“我对目前在上海的工作和生活状况感到满意”,分为:①“不同意”;②“不清楚”;③“同意”。其余指标也采用类似的方法设计^[13]。

经过 KMO 检验和巴特利特球度检验,发现 8 项指标达到了因子分析的要求,进而采用最大方差法旋转,共抽取 4 个因子,表 2 报告了各个测量指标与主要因子之间的载荷重量。根据因子负载表,工作满意度(0.762)、办理本地社会保险(0.613)、收入满意度(0.743)3 项指标与因子 1 密切相关,将其命名为“经济融合因子”。本地语言掌握程度(0.847)、社会交往范围(0.765)2 项指标与因子 2 密切相关,将其命名为“社会融合因子”。本地文化认同程度(0.643)、城市价值观认同(0.742)2 项指标与因子 3 密切相关,将其命名为“城市身份认同因子”。因子 4 由 1 个指标单独构成,即未来居留意愿,定义为

“城市发展意愿因子”。4 个因子共解释了总量 73.21% 的方差变异,从而构成农民工城市融合的 4 个结构维度。为方便理解,我们还要将以上 4 个因子的信息贡献率作为权重,按百分制转换为 1~100 之间的标准分。

(三)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 2 个层面(见表 3):一是个人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居留时间;二是家庭特征变量,通过是否与家人一起

迁移来反映。其中,年龄、居留时间作为连续变量直接纳入分析模型,其余变量需要编码成虚拟变量再纳入模型。

四、回归分析

本文分别以经济融合程度、社会融合程度、城市身份认同、城市发展意愿为因变量,采用强制进入回归法,将社会信任变量连同控制变量一起纳入回归模型中,从而得到社会信任变量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合程度的 4 个多维 OLS 回归模型,结果见表 4。

1. 特殊信任与城市融合

特殊信任对城市发展意愿和社会融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某种信赖预期,如亲人的陪伴、同乡能够提供经济和情感支持的预期等,是农民工愿意留在城市发展,扩大社会交往圈子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特殊信任对农民工的经济融合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特殊信任对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度也没有产生显著性影响,但负向的回归系数表明了一种趋势,即特殊信任不足以影响农民工对非农身份的认同,相反甚至可能产生内卷化认同。

2. 一般普遍信任与城市融合

一般普遍信任对城市融合各指标都有显著性影响。对经济融合的回归系数表明,增加与熟人圈外的异质性群体的交往和信任有利于农民工获得更好的职业阶层和收入。根据社会分层理论,在一个分层体

表 2 农民工城市融合因子分析摘要表

指标	提取因子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因子 4
1. 工作满意度	0.762	0.215	-0.124	0.132
2. 办理本地社会保险	0.613	0.164	0.235	0.097
3. 本地语言掌握程度	-0.123	0.847	0.135	0.253
4. 本地文化认同程度	0.014	0.057	0.643	0.186
5. 城市价值观认同	0.198	0.236	0.742	0.236
6. 收入满意度	0.743	0.034	0.031	0.167
7. 未来居留意愿	0.254	-0.032	0.145	0.594
8. 社会交往范围	0.263	0.765	0.216	-0.032
新因子命名	经济融合	社会融合	城市身份认同	城市发展意愿
特征值	2.41	1.49	1.36	1.23
方差贡献率	31.24%	13.46%	15.26%	13.25%
累积方差贡献率	31.24%	44.70%	59.96%	73.21%

表 3 各变量的具体定义、赋值及分布情况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与赋值	变量类型	均值	标准差
控制变量				
个人层面				
年龄	实际年龄(岁)	连续	34.58	7.47
居留时间	实际居住时间(年)	连续	7.28	3.22
性别(参照组:女性)	男性=1,女性=0	虚拟	0.59	0.49
婚姻状况(参照组:未婚)	已婚=1,未婚(包括离婚、丧偶)=0	虚拟	0.72	0.45
教育程度(参照组:小学及以下)	初中=1,其他=0,	虚拟	0.63	0.48
	高中及以上=1,其他=0		0.18	0.38
家庭层面				
迁移方式(参照组:个人迁移)	家庭迁移=1,个人迁移=0	虚拟	0.72	0.45
社会信任变量				
特殊信任		定距	3.23	12.34
一般普遍信任	信任得分均值(1-4分)	定距	2.06	17.10
典型普遍信任		定距	1.51	14.05
因变量				
经济融合		定距	49.85	16.85
社会融合	1-100分	定距	45.08	20.96
城市身份认同		定距	47.32	22.85
城市发展意愿		定距	51.23	16.17

系中,相同阶层的人们在权力、财富、声望等方面相似性高,他们之间往往是熟人圈内关系;而不同阶层的人们资源相似性低,他们之间往往是熟人圈外关系。在工具性行动中,农民工如果能与更多的熟人圈外群体建立信任关系,并积极调用熟人圈外关系的帮助,无疑有利于他们获得更好的工作和收入。

另外,一般普遍信任对社会融合、城市发展意愿、城市认同度也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民工对城市居民的信任感受越正面,其社会交往范围越广,留在城市发展的可能性越大。同时也能

表 4 社会信任对农民工各维度城市融合程度影响的 OLS 回归模型

变量名称	模型 1 (经济融合)		模型 2 (社会融合)		模型 3 (城市发展意愿)		模型 4 (城市身份认同)	
	B	SE	B	SE	B	SE	B	SE
控制变量								
个人层面								
性别 ^a	0.038	1.630	0.067***	0.543	1.870*	0.196	0.082*	0.559
婚姻状况 ^b	0.022	0.616	-0.937***	0.935	0.055***	0.523	0.037	0.501
教育程度 ^c 初中	0.079	1.372	0.088	0.455	-2.874	0.197	0.029	0.560
高中及以上	0.168	0.067	0.082**	0.111	0.068	0.784	0.087**	0.977
年龄	0.047***	0.153	0.025	0.230	-0.073	0.206	-0.048**	0.146
居留时间	0.062***	0.259	0.050***	0.389	0.061***	0.348	0.020*	0.247
家庭层面								
迁移方式 ^d	-0.017*	0.913	-0.064	0.878	0.044**	0.576	0.025	0.829
社会信任变量								
特殊信任	0.026	0.546	0.033**	0.906	0.079**	0.391	-0.717	0.117
一般普遍信任	0.043*	0.875	0.054**	0.163	0.093**	0.831	0.074**	0.010
典型普遍信任	0.049	0.993	0.036**	0.923	0.047	0.511	-0.238	0.492
常数	11.073	0.634	25.888	0.030	19.275	0.016	36.342	0.079
调整后的 R ²	0.207		0.513		0.524		0.490	
F 检验值	218.95***	246.95***	112.94***	337.71***				

说明:1. * $p < 0.1$, ** $p < 0.05$, *** $p < 0.01$ (双尾检验)2. a:参照组:女性;b:参照组:未婚;c:参照组:小学及以下;d:参照组:个人迁移。

促进农民工对城市文化的了解和熟悉,从而使农民工逐渐认同自己的非农身份。

3. 典型普遍信任与城市融合

典型普遍信任的影响相对较小,仅对社会融合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根据贝拉的理论,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对社会友善、慷慨对待他人的人,比那些冷漠和封闭的人,更能体会到精诚团结、友好互助、善良公益等积极的人际关系处理方式^[14],从而有利于促进交友意愿和扩大社会交往范围。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从社会信任的具体维度来看,不同的社会信任变量对农民工城市融合不同方面的影响大小则略有不同,特殊信任仅对城市发展意愿、社会融合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一般普遍信任对城市融合的各个维度,即经济融合、城市发展意愿、城市认同度和社会融合都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典型普遍信任仅对社会融合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

可见,特殊信任、一般普遍信任和典型普遍信任对农民工社会心理文化层面的融合影响较大,如扩大社会交往范围、提高城市发展意愿等等,对经济层面融合的影响则具有局限性,仅仅是一般普遍信任对经济融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五、政策启示

本文研究表明,社会信任对于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经济融合相比,社会信任对社会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农民工的社会信任水平是提升农民工社会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水平的有效途径,而社会心理融合是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关键因素,因此,增进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信任和认同程度,对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融合意义重大,对公共管理政策启示在于:

1. 引导农民工树立自信心,提高其知识文化水平,促进农民工积极、主动融入城市

由于农民工在文化水平上的不足,加之社会舆论的偏见等,导致部分农民工产生自卑心理,社会信任范围以熟人圈内为主,对本地居民等一些外界群体及城市产生了很多的负面评价和生活体验。而一旦负面印象产生过多,就容易对这座城市产生更多的区隔和疏离情绪。因此,首先从农民工自身出发,农民工要树立自信心,坚信自己能够通过努力奋斗改善在城市的生活境遇,增强融入城市的自信心和自觉性,进一步提升农民工对他人的社会信任水平。

2. 本地居民应努力减少与农民工之间的不信任因素,消除冲突和隔阂情绪

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受到公平和慷慨对待的人,更愿意倾听和理解他人,更容易对他人产生信任。而

受到不公或敌视的人,对外界的态度和看法会更加冷漠和趋于负面,从而也就更加不相信他人。如此看来,本地居民善待农民工也就是善待自己,本地居民帮助农民工群体恢复自信,帮助农民工从农村人转变为城市人,使农民工感到本地居民在接纳他和认可他,反过来农民工也会更加信任本地居民,以此推进和谐关系的构建。

3. 制度改革对提高农民工的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心理融合程度必不可少

社会信任对农民工的经济融合作用有限,但经济融合反过来对社会信任有重要意义。而经济融合本身更多地受制度约束^[15],所以政府应该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提高农民工的工资福利水平,强化农民工的工资支付制度,为农民工在城市中购买住房、供子女上学和生活等提供良好的物质支持。通过以上措施,为农民工的社会信任和社会心理融合创造必要的条件,使农民工愿意在城市居留和谋求长远发展,增强对这个城市的认同感和信任度。

4. 拓展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

广泛的倾诉渠道和社会支持对于缓解负面的情绪有重要作用,有助于扩大社会交往范围,有利于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对此,政府应该整合社会资源,完善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建设,使企业工会、社区、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增强服务功能,为农民工提供更多元化的社会服务和社会支持,让他们体验到更多的社会照顾和社会关怀,从而赢得农民工对城市社会更深层次的信任。

[参考文献]

- [1] Simmel, Georg.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Glencoe [M]. IL: The Free Press, 1950: 77 - 90.
- [2] 杨中芳, 彭泗清. 中国人人际信任的概念化: 一个人际关系的观点[J]. 社会学研究, 1999(2): 1 - 21.
- [3] 杨宜音. “自己人”: 信任建构过程的个案研究[J]. 社会学研究, 1999(2): 38 - 52.
- [4] R. Hardin. conceptions and explanations of trust, in k. s. cook, ed., trust in societ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1: 23 - 31.
- [5] 郭庆, 吴瑞君, 张红星. 农民工传统熟人社会网络的延续与建构——一个信任分析视角[J]. 西北人口, 2013(5): 113 - 118.
- [6] 郭星华. 漂泊与寻根——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49 - 58.
- [7] 张康之. 在历史的坐标中看信任[J]. 社会科学研究, 2005(1): 11 - 17.
- [8] 郑也夫. 信任的简化功能[J]. 北京社会科学, 2000(3): 113 - 119.
- [9] 高虹, 陆铭. 社会信任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J]. 中国农村经济, 2010(3): 12 - 34.
- [10] Almond, Gabriel A. &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63: 28 - 41.
- [11] Castel, R. The roads to disaffiliation: insecure work and vulnerable relationship,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4(3), 1996: 44 - 63.
- [12] 雷开春, 张文宏. 城市新移民的社会信任及其与社会交往的关系剖析[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2(6): 59 - 64.
- [13] 余运江, 高向东, 郭庆. 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基于上海的调查分析[J]. 人口与经济, 2012(1): 57 - 64.
- [14] Bellah, R. & R. Madsen, W. Sullivan, and S. Tip - ton. Habits of the Heart [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126 - 143.
- [15] 悦中山, 李树苗, 靳小怡, 等. 从“先赋”到“后致”: 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合[J]. 社会, 2011(6): 130 - 152.

[责任编辑: 张秀宁]